

非洲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

王学军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的近 20年,非洲非政府组织发展十分迅猛,并在权力地位、人员构成及基本性质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互动的迅速增进,以往由官方主导的中非关系添加了越来越多的民间因素。非洲非政府组织开始以多种方式关注并参与中非关系的发展,并成为影响中非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对而言,中国同非洲非政府组织的交往与关系发展较为滞后。为此,中国必须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加深对非洲非政府组织外交重要性的认识,在巩固中非官方外交关系的基础上,增进与非洲非政府组织的沟通与交流,以进一步夯实中非友好合作关系走向更加稳定与和谐的基础。

关键词 国际关系 中非关系 非政府组织 中非合作论坛

作者简介 王学军,法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金华 321004)。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互动的迅速增进,中非关系显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与趋势。其中之一就是以往由官方主导的中非关系中添加了越来越多的民间因素。中非民间组织与力量在中非交往中日益活跃,地位日益重要。越来越多的非洲非政府组织关注并参与中非关系的发展,并成为影响中非关系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和理解非洲非政府组织的现状与特点及其对中非关系的影响,对于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中国对非洲外交政策与实践,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走向长期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非洲非政府组织的现状与特点

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40年代,但直到 80年代才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乃至被描述为“非政府组织的十年”¹。20世纪 90年代以来,非洲非政府组织继续强劲发展,并呈现出两个显著趋势:一是数量猛增。例如肯尼亚非政府组织在 1996~2003年经历了规模最大的发展,注册数量由 511个增加到

2 511个。而坦桑尼亚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速更快:从 1990年的 41个增加到 2000年的约 1万个。² 据统计,截至 2004年,在非洲影响较大的非政府组织至少有 3 776个。”二是非洲本土化趋势明显。非洲非政府组织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活动及其在非洲设立分支机构。到 20世纪 80年代末,由于殖民体系濒临彻底瓦解,西方非政府组织及其赞助者的最重要回应之一就是非政府组织本土化。在肯尼亚,1978~1988年,国外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增速几乎是本地非政府组织的 2倍。这种情况在 1988~1996年发生了逆转,非洲本地非政府组织增长的速度几乎是国外非政府组织的 3倍。³ 数量巨大和日益本土化的非洲非政府组织在权力地位、人员构成、基本性质等方面呈现出

¹ Maurice Nyananga Amutabi *The NGO Factor in Africa: the Case of Arrested Development in Kenya*,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58.

² Julie Heam “African NGOs: The New Comprador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8, No. 6, 2007, p. 1096.

³ <http://www.un.org/africa/osa/ngodirectory/index.htm>.

⁴ Julie Heam op. cit., p. 1101.

下列特点:

(一) 非政府组织在非洲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 并与现代政府、传统势力一起形成了一种权力分享的态势

近 20 多年来, 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与影响迅速发展, 从人道主义救援、社会服务等狭窄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 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各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它们不仅承担了国内政治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职能, 而且成为联合国体系中国际组织更有效、更可靠的合作伙伴。¹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及其他西方私人及官方援助机构对非洲援助的大部分是通过非洲非政府组织来完成的。而且, 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地位由于西方国家的推动而得以加强。在西方看来, 实施结构调整方案的失败及非洲经济长期落后与非洲各国政府管理不善之间有密切关联。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非洲需要外部导师来指导和监督非洲的政治社会生活, 非政府组织就成了非洲的便利工具。² 于是, 在西方势力的推动下, 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代表开始分担非洲国家的社会管理、服务甚至政治职能, 并逐渐形成了非洲政治社会生活中“政府-部族-公民社会”的权力结构态势。

(二) 非洲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和成员大多由知识精英组成

这些知识精英大致可以分为 3 种类型。第一种是比较激进的精英。他们以前就参加过或被卷入过政治斗争, 对改革和转型有明确的观点, 但多少受到集权主义者的压制。他们利用非政府组织在政治上表达他们的观点, 视非政府组织为为变革而斗争的阵地。这部分精英是受政治因素驱动的。第二种精英包括受利他主义动机驱动、怀有良好意愿的个人。其目的是改善同胞的生活状况。换句话说, 这部分精英是受道德因素驱动的。第三种是主流精英, 常常是前政府官僚, 他们发现捐赠资金流向非政府组织, 于是就转到了非政府组织。这类精英的动机仅仅是职业主义的。他们受物质利益的驱动, 而不是利他主义者。由于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工作职位越来越难以获得, 或者由于竞争越来越激烈, 这部分人数正在不断增加。”有很多精英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流动。非洲非政府组织的这一构成特点, 决

定了它们在非洲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三) 非洲非政府组织大多与西方国家政府联系密切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许多在非洲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本是国际(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分支机构。例如, 非洲发展合作与研究协会(ACORD)是为非洲发展与社会公义而工作的欧洲与加拿大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协会。索罗斯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记者无国界等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非洲都设有分支机构。以索罗斯基金会为例, 它在非洲的分支机构包括: 南非开放社会基金会、东非开放社会倡议、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和西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等。³ 在索罗斯基金会的支持下, 这些分支机构以各种方式深深卷入并深刻影响非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

2. 多数非洲本土非政府组织的运营都由西方国家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来源。以非洲社会公义网络(Fahanu)为例, 其 2006~2007 年的主要赞助者都是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包括福特基金会、基督救助会、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等。⁴ 因为对西方捐赠者的资金依赖, 这些非政府组织在运作中独立程度不一, 行动范围十分有限, 这一点即使是最偏激的非政府组织精英也不得不承认。⁵ 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发展援助项目和国际倡议中更多地以西方社会的价值标准作为衡量尺度, 有意无意间渗透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就使非洲非政府组织具有某种亲西方的立场, 而很难真正体现非洲本土的声音。从国际秩序角度看, 一位非洲学者甚至断定, 冷战结束后, “非洲非政府组织的突然增长及其在非洲的突出地位, 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组

¹ See Fimæ Manji “The missionary position NGO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Issue 3, 2002, pp. 579-581.

² See Issa G. Shivji *Silences in NGO Discourse: The Role and Future of NGOs in Africa*, Oxford: Fahanu, 2007, pp. 20-23.

³ See *ibid.*, pp. 30-31.

⁴ See <http://www.soms.org/initiatives/regions/africa>

⁵ 参见非洲社会公义网络(Fahanu) 2006~2007 年度报告, <http://www.fahanu.org/about>

⁶ See Issa G. Shivji *op cit.*, p. 31.

织性和观念性的新自由主义攻势的一部分”¹。

由于非洲非政府组织享有重要的权力地位、亲西方性、精英性等特点，非洲非政府组织一旦开始关注中非关系，就必然成为影响中非关系的重要因素。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在认可中国对非洲发展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必然会掺杂着对中国在非洲存在日益增加的疑惧与担忧，各种指责也难免发生，从而对中非关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非洲非政府组织 影响中非关系的动因与途径

(一) 非洲非政府组织介入中非关系的动因

非洲非政府组织介入中非关系是其日益深化的必然结果。这一方面反映出中非关系的发展开始深刻影响非洲内部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乃至引起了非洲公民社会的极大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在非洲影响力的增强开始牵动西方大国利益，并造成了西方的担忧与不适。

在很多非洲非政府组织看来，非洲国家政府领导人对中国不附加条件的贸易、投资与援助，以及中国自身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都持欢迎态度。²而事实上，他们同样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是复杂的，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此，非洲必须进行客观评估并从非洲利益出发采取共同的应对政策。在这方面，非洲的政府间组织（如非盟）由于其结构性弱点而很难有所作为，非洲非政府组织则更有可能采取共同的回应政策，以应对中非关系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正是在中国参与非洲发展这一客观形势，以及非政府组织主体责任意识增强的背景下，非洲非政府组织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中非关系中来。

非洲非政府组织参与中非关系的另一动因是西方大国的推动。在20世纪80年代非洲结构调整方案实施以来，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西方大国推行其政治经济模式的更具合法性的隐蔽工具，是西方国家政府延伸到非洲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它不是非洲本土发展进程的管理者，而是国外援助资金的本地管理者”，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³。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迅速提

升，欧美等国家开始积极寻求多种手段来约束中国，试图将中国纳入它们的非洲战略框架。非政府组织就此成为欧美等西方大国延缓中国在非洲影响力增长，并将中国纳入它们对非洲多边合作框架的重要力量。⁴正是在欧美大国的推动下，很多非洲非政府组织开始关注中非关系。

随着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中国对非洲外交政策实践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中非关系必将继续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影响非洲发展进程。在此背景下，非洲非政府组织将会更加关注中国和平发展及其对非洲政策。因此，它们作为中非关系中的新因素将越来越重要。

(二) 非洲非政府组织影响中非关系的途径

非洲非政府组织影响中非关系的途径大致如下：

1. 通过大众媒体发表言论以影响舆论 一些非洲非政府组织精英经常在西方媒体和非洲本地重要媒体上，就中非关系发展现状及影响等问题接受采访、发表言论，这些媒体言论连同西方媒体对中国对非洲外交的批评和指责，成为影响中国在非洲国际形象的重要舆论力量。此外，一些著名的非洲非政府组织还建立了新闻网站，成为它们发表观点、影响非洲舆情的重要阵地。例如，非洲社会正义网络主办了一个新闻网站（Pambazuka News），并专设了“中非关系观察”栏目，成为引导非洲对华舆情的重要平台。

2. 组织对中非关系的专题研究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闭幕后，中非合作关系引起了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关注与反思。非洲社会正义网络先后编发了《非洲人对中国参与非洲的观点》和《中国在非洲及南方世界的新角色：一种新视角》两部论文集，探讨中非关系及中国

¹ Issa G. Shivji op. cit., p. 26.

² See Ndubisi Obiorah “Who’s afraid of China in Africa? Towards an African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ited, *Africa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Nairobi and Oxford: Fahamu, 2007, pp. 39–40.

³ See *ibid.*, pp. 49–53.

⁴ Julie Heam op. cit.

⁵ See “The Changing Role of NGOs and US–China Rivalry for Africa”, http://www.eprlf-sf.org/uploads/changing_NGO_US_China.pdf

参与非洲发展对非洲的影响与意义。非洲经济研究协会 (The 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专门组织了关于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影响的研究课题,以非洲 22个国家为案例,对中非经济关系、中国对非洲援助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发现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关键特征、模式及其对非洲各国的影响,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评估中国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对非洲各国影响的性质、范围与维度,辨明其对非洲各国的具体机遇与挑战”¹,并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这些站在非洲立场上进行的研究对非洲各国对中国政策及中非关系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3. 直接参与中非交往 2007年5月,在上海召开非洲开发银行年会的同时,“中国发展简报”与“非洲公义网络”共同主办了首次中国与非洲非政府组织对话会议。非洲非政府组织代表就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强的影响、中非关系的性质、中国对非洲政策中的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条件等问题与中国代表进行了开放式的讨论与对话。这为中非民间交往、增进中非社会相互理解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与平台。2008年4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第二次“中非公民社会对话会”,与会的非洲非政府组织普遍看好中非关系,而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企业的社会责任、环保及劳工权益方面。通过这种直接对话和参与活动,非洲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的理解。

非洲非政府组织 对中非关系的影响

客观地讲,由于中非关系刚刚开始进入非洲非政府组织关注的视野,所以它们对中非关系还没有形成清晰固定的认知模式。随着中国对非洲外交政策与实践、非洲自身发展需求、中国与非洲、西方三方关系等因素的变化,非洲非政府组织对中非关系的观点与态度也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因此,它们对中非关系的影响也将是动态变化的。但就目前而言,它们对中非关系的认知与影响不仅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一些非洲非政府组织精英认为,中国与非洲

关系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主导转变为正常的经济利益追求,这给非洲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机遇。“那些认为中国的影响仅仅带来问题,或者仅仅是过去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中国参与同西方公司和政府的竞争为非洲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政策操作空间。”²这些相对客观和积极的态度与认知对中非关系而言无疑是有益的。特别是近两年开始的由中非双方非政府组织主办的中非公民社会对话会议,为双方加强相互了解、消除误解与分歧、增进协调与合作创造了机制化平台,对双方共同推动中非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除了这些积极影响外,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非洲非政府组织在民主与人权、中非贸易结构、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等诸多具体领域对中国提出的批评与指责。”这些态度虽然不是非洲的主流,但确实直接或间接地对中非关系构成了潜在的挑战。

(一) 可能破坏中国国际形象及中非间原有的认同与情感,从而削弱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

中非双方由于有被殖民和被奴役的共同历史经历、作为第三世界的共同身份地位、追求独立与富强的共同目标,彼此间形成了强烈认同感和深厚友谊。中国也因大量对非洲无私援助,以及在国际社会敢于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而在非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但少数非洲非政府组织附和西方势力诬蔑中国的腔调,不仅破坏了中国在非洲及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形象,而且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中非友谊与合作关系造成了损害。例如,在苏丹达尔富尔部署维和部队问题上,非洲行动组织呼吁“美国应发挥领导作用,而中国则是联合国安理会对苏丹制裁的主要障碍”³,并指责中国对苏丹的政策无视达尔富尔地区的人

¹ http://www.aerafrica.org/documents/announcements/Call_for_proposal_M_PACT_OF_CHINA_AFRICA_%20A_ID_RELATDNS140408.pdf

² <http://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32432>
» 参见罗建波:《非洲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第10~12页。

³ A Chance to Change Course in Darfur: Next Steps for the U. S. Presidency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http://www.africaaction.org/newsroom/index.php?op=read&documentid=236&type=15&issues1024>

道主义灾难。该组织负责人尼·阿库特 (Ni Akuetteh) 声称,“美国应向关键行为体如中国施压,以推进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维和部队”¹。还有非政府组织人员误认为,对于那些遵循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非洲国家,“中国经济援助怂恿了精英主义,加深了社会分裂,助长了腐败”²。这些误解甚至歪曲的言论对于中非关系的发展势必造成负面影响。

(二) 影响非洲国家对中非合作的利益认知,从而从根本上削弱非洲发展中非合作关系的动力与基础

在近年来的中非合作中,中国获得了丰富的能源资源供应、大量的投资机会与广阔的商品市场,以及在多边外交中来自非洲国家坚定的政治支持。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获得了大量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新的经济贸易渠道、丰富而廉价的生活制成品和可供选择的新发展模式。”正是这种互利共赢的利益基础为中非双方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根本动力。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对中非关系的误判性认知。例如,有某些非政府组织人员误认为,尽管中国反复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其实中国已深深卷入其非洲伙伴国的内部事务,不过其影响总是有利于统治集团。³从非洲自主发展能力看,部分非洲公民社会人士认为,中非关系更像是“施与者与接受者”的关系,“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主要是单方面的,所有项目和议题的制定都来自中国方面的设想”,⁴因而担心中国对非洲援助可能导致非洲国家的发展愈发依赖中国,而不是靠本国的资源和本国人民的智慧。鉴于国家利益的建构性特征,如果非洲非政府组织对中非关系的误判与指责长期持续,可能会影响非洲国家对中非合作关系中自身利益的认知,从而对中非合作的根基构成潜在挑战。

(三) 助长对中非经贸关系问题的误解,从而对中国在非洲的一些具体利益构成挑战

2004年3月,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突尼斯、肯尼亚和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参加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延长取消纺织品配额限制,以减缓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对这些国家纺织服装业产生的巨大冲击。截至2005年底,南非对中国出口产品共发起36起反

倾销调查,涉及轻工、土畜产、医药保健品、纺织、五矿等各类产品,其中对大部分发起调查的产品都征收了高额反倾销税,迫使中国多种产品退出南非市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至2005年,中国共遭受非洲国家反倾销及保障措施案48起,占中国遭受国外贸易保护调查案件总数的6.2%,远高于中非间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⁵发生这些贸易摩擦与某些非洲非政府组织对中非贸易结构的不当认知不无关联。

中国与非洲

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发展

非洲非政府组织已经参与中非关系,并成为影响中非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一客观现实使中国对非洲非政府组织外交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相对这一新形势而言,中国与非洲非政府组织的交往与联系还较为落后。

中国与非洲非政府组织的交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非洲双边层次的交往。中国对非洲双边层次的交往特点是非对称性;二是在联合国、世界社会论坛等全球机制平台层面的交往。其中,中国政府在对非洲地区组织、各国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的交往中处于中心地位,形成了“一对多”的非对称交往格局。

从中非双边层次看,中国与非洲民间往来由来已久,主要表现为中国与非洲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对非洲医疗援助等活

¹ <http://www.africaaction.org/newsroom/release.php?op=read&documentid=241&type=2&issue=1024>.

² Ili Askouri “China’s investment in Sudan Displacing Villages and Destroying Communities”,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ited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Nairobi and Oxford: Fahamu, 2007, p. 73.

³ See Chris Allen “China in Africa”, *Survival*, Vol. 47, No. 3, Autumn 2005, pp. 147–164.

⁴ See Ili Askouri op. cit., 2007, p. 73.

⁵ V. Maurice Gountin “China’s Assistance to Africa: A Stone Bridge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http://www.cctrust.hk/china-africa/papers/Gountin_Maurice.pdf.

⁶ 周建青:《中非经贸合作稳步发展——2005年中非经贸合作情况及2006年展望》,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1期,第17–18页。

动。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发展和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中国政府更加积极推动中非民间交往。中非合作论坛 2003 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和 2006 年《北京行动计划》中都把推动和引导中非民间交往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尤其是积极推动双方青年之间的交流。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2002 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开始启动，中国青年志愿者于 2005 年开始奔赴非洲，提供志愿者服务。同年，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的成立为中国对非洲非政府组织的交往创造了机制平台。2007 年 5 月，中国与非洲非政府组织在上海举行了首次直接对话会议，为中非民间交往、增进中非社会相互理解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与平台。

中国也开始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性机制来施展对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外交影响。2005 年，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扫盲奖”。2007 年，尼日利亚非政府组织“家庭再定位教育和授权”获得这一奖励。2008 年，南非的“行动升级”和埃塞俄比亚的“成人和非正规教育”两个非洲非政府组织获得此奖项。中国通过参与全球性机制扩展了对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影响。

尽管中国已经开始把非洲非政府组织纳入对非洲外交总体框架，但无论相对日益深化的中非政治和经济关系而言，还是和西方与非洲非政府组织关系相比，中国与非洲非政府组织关系都大大落后了。从中国与欧美西方国家在非洲竞争的角度看，中国对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则显得更为薄弱。¹ 在西方，非洲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推行对非洲战略的重要手段与工具。而中国与非洲非政府组织关系无论从机制、活动数量与实效来看都远远不足，这与中国对非洲外交总体发展态势是不相称的。

中国对非洲非政府组织交往的滞后也反映出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中非关系发展中的缺位。中国

非政府组织虽然在近年来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其主要关注国内议题，很少参与国家对外关系。这种情况也妨碍了中国对非洲公共外交，削弱了对外宣传的可信度，减少了中国得到反馈信息的数量，限制了中国评估现存外援方案并加以改善的能力，² 从而影响了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整体效果。

结 语

由于非洲非政府组织在非洲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非洲非政府组织在中非关系中的参与和影响也将日趋扩大，所以重视和把握好中非关系中的非洲非政府组织因素，加强对非洲非政府组织外交，已经是中国对非洲外交面临的一项新的紧迫任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推动世界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重要基础。”目前，中非民间交往在范围、数量和深度上都十分欠缺。为此，我们必须顺势而变，在巩固中非官方外交的基础上，加强与非洲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在中非之间构建起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中非合作关系走向更加稳定和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安春英)

¹ See Seattle, WA, “The Changing Role of NGOs and US-China Rivalry for Africa”, http://epuf-sf.org/uploads/changing_NGO_US_China.pdf

² See Lu Yiyi “Blind Spots in China’s Soft Power”, *The Straits Times*, 9 July 2007.

»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午餐会上的演讲：《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8年3月23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lt/zqjh/t418780.htm>.

编者按：随着近年中非经贸关系发展日益密切，不仅中国商人到非洲国家开拓市场倍受关注，而且非洲人在中国经商也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关注的就是在中国广州从事商贸活动的非洲人团体。作者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进行实地专题调查研究，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看法。本文不仅会加深我们对生活在中国的非洲人的认知，也对拓宽中非关系的研究视野是一次有益探索。

全球化时代的非中关系： 在华非洲商贸团体的角色*

[加纳] 亚当斯·博多莫**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5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非洲人团体在亚洲的大城市（如北京、东京、首尔和孟买等地）陆续建立起来。在中国，非洲人团体不仅在北京，而且在上海、南京和香港¹等其他城市也有聚居现象。香港、澳门、尤其是广州等中国南方城市²的非洲人和非洲裔人的数量远多于中国其他地区。

从现在非洲人、非洲裔人移居与在华建立团体的速度和情况来看，我们不难预见，再过一百年，在广州市中心和中国其他主要城市，将会出现稳定的少数族群——非洲裔中国人，他们将要求自我认同等。到那时，下列问题就会被提出来：谁是这些少数族群的先驱？他们来自何地？为何而来？他们有哪些语言和文化背景？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这些团体的成员面临怎样的挑战？

本文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一些解答。居于广州的这一团体是中国最大的非洲人团体，因此，我们以此作为在华非洲人团体的个案分析对象。根据较为详细的问卷调查、深度采访和团体互动，我们勾勒出这一团体的基本情况，指出了非洲人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认为，促进非中关系的一个最佳途径就是承认在华非洲人的重要贡献，关注他们的生存现状，使他们成为非中社会经济一

体化过程中的重要桥梁。

文献回顾、理论构建及 研究地的背景

（一）文献回顾

广州的天秀大厦和小北路在中国内地、香港及欧洲国家的日报、周报和其他期刊杂志、新闻报道中被广泛提及。但是，专门研究这一新兴非

*本文作者感谢香港大学研究资助委员会对“在华非洲人：香港和广州的案例”研究项目的资助，同时感谢研究助手龙君儿（Frances Lung）和杨晓霖（Yeung Hiu Lam）。

** 本文作者亚当斯·博多莫（Adams Bodomo），加纳人，香港大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非洲研究项目召集人。

¹ See Bertonecelh Brigitte and Sylvie Bredeloup, “The emergence of new African ‘Trading Posts’ in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China Perspectives*, No 1, 2007, pp 94 - 105. Bodomo A. B., “An Emerging African-Chin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The Case of Tsin Sha Tsui’s Chungking Mansions”, in Kwesi Kwaa Prah ed., *Afro-Chinese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ape Town, South Africa: The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African Societies, 2007a, pp. 367- 389.

² See Bertonecelh Brigitte and Sylvie Bredeloup op. cit.; Bodomo A. B. “The Emergence of Africa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Invited Paper for Africa Table, Stanford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re, May 23rd, 2007. Li Zhigang, Xue Desheng, Michael Lyons and Alison Brown, “Ethnic Enclave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obei Guangzhou”, 2008, paper draft.